

中国社会学学会 1996 年年会综述

由中国社会学学会主办, 辽宁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辽宁省社会学学会承办的“中国社会学学会 1996 年年会暨第四届理事会”于 1996 年 8 月 2 日至 8 月 6 日在沈阳兰亭宾馆召开。这次会议云集了全国社会学界著名专家、学者百余人, 并邀请了国家有关部门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辽宁省和省政府领导 20 余人。

辽宁省委副书记曹伯纯、辽宁省副省长郭廷标、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吴介民和辽宁省社科院院长阎福君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社会学学会名誉会长雷洁琼教授为会议发来了贺信, 信中肯定了 16 年来中国社会学界的广大同仁为恢复和发展社会学、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做的贡献, 并希望社会学工作者“进一步增强使命感, 要勇于回答和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 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这次年会由两部分内容构成, 一是进行以“21 世纪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与社会学历史使命”为主题的理论研讨会; 二是举行中国社会学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在大会过程中, 这两部分内容交替进行, 现分别述要如下。

—

本次年会研讨的主题是: “21 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学历史使命”。研讨的方式是“大会发言+即席提问”, 即先由发言者阐述自己论文的基本思想和内容, 然后由大家即席提问, 与发言者沟通。这种方式与通常的分组讨论相比, 虽很难产生激烈的辩论和争鸣, 但却让更多的学者有机会在大会上发言, 时常有尖锐的提问并伴之耐心的解答, 似乎更具有理性化色彩。整个会议的气氛热烈融合。研讨所涉及的主要方面有:

1. 关于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学面临的机遇和任务

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两个转变”的关键时期, 随着经济的发展, 社会结构与必然要加速发生变化。这一方面给社会学提供了一种良好的发展机遇, 另一方面也使它肩负起艰巨的任务和面临严峻的挑战。中国社会学能否在社会变革中抓住机遇, 迎接挑战, 并在为社会多做贡献的同时发展自身, 是每一个社会学工作者都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在研讨中, 与会学者从不同层次和方面讨论了中国社会学面临的任务。

陕西师范大学的王绩同志提出, 为迎接 21 世纪的挑战, 中国社会学必须尽快地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框架, 这一框架必须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主线, 以中国社会现存的重大社会问题为基本内容。他认为, 面对 21 世纪, 直接影响社会整体进程的重大问题有 5 个, 即人口老龄化问题; 独生子女问题; 失业问题; 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和环境与资源问题。中国社会学家应围绕如何分析和解决这 5 个问题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实现时代赋予社会学的历史使命。

福建省委党校的傅家栋同志认为, 社会学工作者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理论和方法上的优势, 加强对我国转型时期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他提出, 应当把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视为现阶段社会学的主要任务。

贵州社科院的史昭乐同志从另一个层面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他认为,社会学工作者在社会转型时期应特别重视人自身的社会化、现代化问题。他提出了一个有别于修养的“教养”概念。他认为,不仅注意少年儿童的教育,而且注重将现代教养作为青年和其他成年人继续社会化的主要内容,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根本途径。

2 国有大中型企业深化改革的社会学思考

要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今年是“九五”计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关键之年。国有企业能否摆脱持续大面积亏损的局面,已是一个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它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并制约着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因此,发现症结,寻求良策,是所有科学工作者,特别是社会学工作者应该承担的重大的历史使命。

郑州大学的纪德尚同志认为,当前国有大中型企业面临着许多难题,其中与社会学密切相关的有这样几个:①国有企业的粗放经营,投入效率低,影响到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的协调动作;②历史包袱沉重,改革难度大,影响到现代企业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配套改革的协调运作;③职工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主人翁地位有所削弱,影响到国有企业改革中制度创新与民主经济发展的协调运作。他提出,应以创新制度,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深化社会改革,加强配套改革和保护职工合法权益,加强主人翁地位等途径来改变上述的种种不协调。

华中理工大学的刘中荣同志在发言中分析了国有企业亏损中的非经济因素。他认为,国有企业亏损问题有着极为深刻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在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这些非经济因素对国有企业的亏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它们包括:①企业自身的非经济性是国有企业亏损的社会历史原因;②社会机制紊乱是国有企业亏损的现实原因;③非经济资源的短缺是国有企业亏损的社会原因。

3 农村社会流动对中国社会及社会结构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其中大部分是跨省越区地涌入东部沿海地区。连绵不断的“民工潮”不但引起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模糊了城乡之间的界限,还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是我国目前和今后若干年内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战略问题。

与会学者认为,民工潮的产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它是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民工潮不但不会停息,而且有可能人员更多、波及更广、流动更快。在对民工潮所引起的结果的评价上,学者们普遍认为,民工潮对于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也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应该切实做好流动人口的管理协调和疏导工作。

公安部第四研究所的牟君发同志提出,流动人口带来的积极作用主要有: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提供了机遇,解决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与劳动力不足的矛盾;②冲击了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缓解了城乡间和地区间的社会经济差异;③促进了沿海与内陆地区的联系与融合,产生了一条文化技术交流的渠道。但也产生了影响社会正常秩序和人员流出地区农业生产的稳定等消极作用。

广东青年干部学院的谭建光同志根据自己的调查提出,在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珠江三角洲,存在有一种农民转向农民工,再转向现代职工的双重转化趋势,并认为这种转化对推动社会超常规变革、加速城乡一体化进程、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的意义。

4. 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的回顾与未来的展望

中国社会学自 1979 年恢复以来,已走过了 17 年的历程。与会代表一致认为,通过过去 17 年的努力,中国的社会学无论在人员、机构方面,还是在研究的内容和成果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如今,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地位已不可动摇地确立起来了。在关于中国社会学今后的发展前景方面,学者们普遍持乐观态度,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地位、研究范围和实际作用都会有进一步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郑杭生在发言中提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地位的提高具有理论上的必然性和实践上的现实性。他认为,中国社会学地位的提高是中国社会转型加速和社会与国家相对分离的必然要求,是非经济因素日益突出的趋势,也是国际社会达成重视社会发展的共识的结果。他还提出,在今后的发展中,中国的社会学将会呈现出本土化、国际化、综合化和成熟化四大基本趋势。

二

本次年会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举行中国社会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会议的主要议程包括:1. 听取第三届理事会的工作报告;2. 审议通过修改学会章程报告;3. 选举产生新的学会领导机构。

8月3日下午,由上届副会长兼秘书长陆学艺同志代表第三届理事会做了以“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努力开创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学的新局面”为题的工作报告。在工作报告中,他总结了第三届理事会自 1990 年 8 月产生以来,在建立健全学会规章制度、推进社会学学术研究和基本建设、促进社会学队伍建设和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并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前景做出了展望。他指出,“今后 5 年乃至 21 世纪,中国社会学应在加强现代化建设中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完善学科建设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说体系、壮大社会学教学和科研队伍、搞好自身建设健全学会组织等方面进一步努力。”

接着,王思斌教授代表换届筹备组做了修改学会章程的报告。他指出,修改学会章程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明确学会的性质、责任和制度。原有的章程在规定学会的性质、责任和制度方面有一些不足之处,有些地方语词定义不够精密,有些地方指称范围不够明确,这都需要修改,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社会学会的研究和活动范围日益扩大,因此有必要增添一些新的内容。这次章程修改总共涉及十几处,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增添了“个人会员”的条款和将会长的任期由 5 年改为 3 年。王思斌教授详细说明了每一处修改的原因和理由。

随后,与会理事分成两组对陆学艺和王思斌同志所做的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

8月4日上午,第四届理事会进行新领导机构的选举。首先由换届筹备小组成员宋家鼎同志向会议报告第四届理事会的筹备情况。他介绍说,根据《中国社会学会章程》的规定,中国社会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的任期已满。早在 1994 年底,经在京会长、副会长商议并报学会名誉会长费孝通、雷洁琼和学会主管单位中国社科院有关领导同意,拟定召开第四届理事会,改选学会领导机构。并决定由学会秘书处组成换届办事机构,具体办理筹备工作。此后,筹备组做了大量工作,并于 1995 年 2 月召开了学会秘书长办公会议,就换届的原则,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换届的方法,理事名额的分配和条件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接着又召开了京津地区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商讨了会议筹备的各种有关问题,并通过了秘书长办公会议议定的事项。在这次会

议召开之前,各地已推选出了113名理事。新一届理事人员构成,从年龄上看,50岁以下者占36.6%;从部门上看,来自科研和教学单位的占70.8%;从职称上看,正、副研究员和教授占93.9%。这一结构基本符合筹备会议的既定目标。接着,他又介绍了各位被推举的常务理事候选人的简历。

随后,理事们进行投票,并产生了陆学艺、郑杭生、王辉等33名常务理事。在当天召开的新一届常务理事会议上,陆学艺同志当选为新任会长,郑杭生、王辉等9人当选为副会长。上届会长袁方教授被推选为名誉会长,常务理事会还根据会长的提名,通过了由宋家鼎同志担任学会的秘书长,并通过了聘任了王康等12位老同志为学会顾问。常务理事会后,新当选的会长又举行会议,就会后工作初步交换了意见,并根据宋家鼎同志的提名,通过了由张健等7人担任学会的副秘书长。至此,新一届理事会的领导人员已全部产生,第四届理事会议获得了圆满成功。在今后的数年里,新一届理事会将带领中国社会学界去履行它的历史使命并迎接21世纪的挑战。

(范广伟)

《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简介

中国的社会史料积累丰富,开展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大有可为。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王日根撰写的《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是目前乡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又一力作。作者选择了明清基层社会中最能体现社会变迁与社会进步的会馆这一社会组织,用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与思维方式,指出明清会馆是以乡土为纽带、流寓客地的同籍人自发设置的一种社会组织,是流动社会中的有效整合工具,是对家庭组织的超越和对社会变迁形势的适应与创造,亦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及其限度。作者首先检讨了过去对会馆概念的认识,从而提出了自己对会馆的界定,接着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角度考察了会馆发展的阶段性与地域差异性。然后作者考察了明清市场机制、人口流动、科学制度发展与会馆的相互关系,揭示了市场机制是明清社会变迁的关键机制,商品经济的发展把全国的大中城市卷入市场网络之中,有的地域商人长期活跃于其中,以致形成大的地域商帮。作者还就会馆的组织结构、会馆的权力配置与内部关系、会馆的经费来源与收支管理等进行分析,让读者更清晰地看出各类会馆内部兴衰的原因。作者还考察了明清阶级关系变化的新特征,即“四民”观念的模糊化、贫富贵贱的迅速变化和阶级利益的明朗化。这些新特征的出现曾令官府行之已久的官僚行政体制束手无策,而会馆作为一种自发的和民间的社会组织在实现会馆内部整合、移民社会整合与中外文化整合方面发挥了自已的作用。书中继而分析了明清会馆与明清文化发展的相互关系,认为,明清会馆文化的取向大体包括:沿海文化与内陆文化的互渗,士绅文化与庶民文化的交融文化继承与文化更新三个方面。在结语部分,作者阐明了会馆的历史地位。认为会馆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在明清社会的结构性变迁中,在从家庭观念走向更广大的乡的观念直至国的观念的过程中起着中介作用。

由此,作者就完整地建立起了他对明清会馆的系统研究框架,较之前人的研究,本书视野较为开阔,方法更为多样,也更贴近社会学的研究路子,具有鲜明的开拓和创新的意义,书中形成的许多见解也足以引起学界的重新思考。

(胡荣)